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学术专著系列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

〔英〕G.L. 克拉克
〔美〕M.P. 费尔德曼 主编
〔加拿大〕M.S. 格特勒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学术专著系列

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

〔英〕G. L. 克拉克

〔美〕M. P. 费尔德曼 主编

〔加拿大〕M. S. 格特勒

刘卫东 王缉慈 李小建 杜德斌 等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5 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英)克拉克等主编;刘卫东
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学术专著系列)
ISBN 7-100-04378-6

I. 牛... II. ①克...②刘... III. 经济地理学—手
册 IV. F119.9-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787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NIÚJIN JINGJI DILIXUE SHOUCE

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

[英]G. L. 克拉克

[美]M. P. 费尔德曼 主编

[加拿大]M. S. 格特勒

刘卫东 王缉慈 李小建 杜德斌 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378-6/F·533

2005年8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0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8 $\frac{3}{4}$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58.00 元

Edited by

Gordon L. Clark, Maryann P. Feldman, and Meric S. Gertle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except Chapter 2 ©Allen J. Scott 2003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3 年平装本译出

内容简介

《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界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广泛地展示了该领域近年来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它汇集世界上 40 多位广为认可的著名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界定了经济地理学这个生机勃勃的交叉学科的范畴,讨论了其发展状态和前沿领域,为今后一个时期该学科的发展确立了研究议程。作者们提出,伴随近 20 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西方经济地理学正处于一个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思维争辩。其中涉及了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如经济变化的驱动力、全球化中地方之作用、区域的成长与衰落、地方创新系统、经济系统的空间重构、全球经济变化中的环境管制等。总体上,本书:(1)捕捉和梳理了这个学科当前的主要研究脉络和相关争论;(2)突出其交叉学科的特性,展开了不同学科在此领域的对话与交流;(3)通过阐述其主要研究脉络和议题,定义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范畴。就其结构而言,本书包括了研究视角、全球经济一体化、公司战略与区位、创新的地理、地方性与差异、全球变革等 6 大部分,共 34 章,几乎涉及了目前西方经济地理学研究中所有前沿议题,其中不少议题国内学者知之尚少。

献给：

诺尔、美兰和劳伦斯

理查德·辛格

安尼塔和兰

“当代地理科学译丛”

序 言

对国外学术名著的移译无疑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源泉之一,说此事是为学的一种基本途径似乎并不为过。地理学界也不例外,中国现代地理学直接就是通过译介西方地理学著作而发轫的,其发展也离不开国外地理学不断涌现的思想财富和学术营养。感谢商务印书馆,她有全国惟一的地理学专门编辑室,义不容辞地担当着这一崇高使命,翻译出版的国外地理学名著已蔚为大观,并将继续弘扬这一光荣传统。但鉴于以往译本多以单行本印行,或纳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类,难以自成体系,地理学界同仁呼吁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丛书,以便相得益彰,集其大成,利于全面、完整地研读查考;而商务印书馆也早就希望搭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双方一拍即合,这就成为这套丛书的缘起。

为什么定位在“当代”呢?可以说出很多理由,例如,当代著作与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关联最紧,国外当代地理学思想和实践日新月异,中国地理学者最需要了解国外最新学术动态,如此等等。至于如何界定“当代”,我们则无意陷入史学断代的严格考试中,只是想尽量介绍“新颖”、“重要”者而已。编委会很郑重地讨论过这套丛书的宗旨和侧重点,当然不可避免见仁见智,主要有以下基本想法:兼顾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优先介绍最重要的学科和流派,理论和应用、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兼而有之,借此丛书为搭建和完善中国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助一臂之力。比较认同的宗旨是:选取有代表性的、高层次的、理论性强的学术著作,兼顾各分支学科的最新学术进展和实践应用,组成“学术专著系列”;同时,推出若干在国外大学地理学教学理论与实践影响较大、经久不衰的教材,组成“大学教材系列”,以为国内广大地理学界师生提供参考。

由于诸多限制,本译丛当然不可能把符合上述宗旨的国外地理学名著与教材包揽无遗,也不可能把已翻译出版者再版纳入。所以,真要做到“集其大

成”、“自成体系”，还必须触类旁通，与已有中文版本和将有的其他译本联系起来。对此，这里很难有一个完整的清单，姑且择其大端聊作“引得”(index)。商务印书馆已出版了哈特向著《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哈维著《地理学中的解释》、詹姆斯著《地理学思想史》、哈特向著《地理学的性质》、阿努钦著《地理学的理论问题》、邦奇著《理论地理学》、约翰斯顿著《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和《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威尔逊著《地理学与环境》、伊萨钦柯著《今日地理学》、索恰瓦著《地理系统学说导论》、阿尔曼德著《景观科学》、丽丝著《自然资源：分配、经济学与政策》、萨乌什金著《经济地理学》等，商务印书馆已启动出版但不列入本译丛的有苏珊·汉森主编的《改变世界的十大地理思想》、约翰斯顿主编的《人文地理学辞典》等，都可算“当代地理学”名著；国内其他出版社在这方面也颇有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苑出版社出版的《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

当然，此类译著也会良莠不齐，还需读者独立判断。更重要的是国情不同，区域性最强的地理学最忌食洋不化，把龙种搞成跳蚤，学界同仁当知须“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说到这里，作为一套丛书的序言可以打住了，但还有些相关的话无处可说又不得不说，不妨借机一吐。

时下吾国浮躁之风盛行，学界亦概不能免。其表现之一是夜郎自大，“国际领先”、“世界一流”、“首先发现”、“独特创造”、“重大突破”之类的溢美之词多到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如有一个参照系，此类评价当可以客观一些，适度一些，本译丛或许就提供了医治这种自闭症和自恋狂的一个参照。表现之二是狐假虎威，捡得一星半点儿洋货，自诩国际大师真传，于是“言必称希腊”，以至经常搞出一些不中不洋、不伦不类的概念来，正所谓“创新不够，新词来凑”；大家识别这种把戏的最好办法之一，也是此种食洋不化症患者自治的最好药方之一，就是多读国外名著，尤其是新著，本译丛无疑为此提供了方便。

时下搞翻译是一件苦差事，需要语言和专业的学养自不待言，那实在是要面寒窗坐冷板凳才行的。而且，既然上述浮躁之风盛行，凡稍微有点地位的学术机构，都不看重译事，既不看作科研成果，也不视为教学成果。译者的收获，看得见的大概只有一点稿费了，但以实惠的观点看，挣这种钱实在是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然而,依然有仁人志士愿付出这种普罗米修斯似的牺牲,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是:戒除浮躁之风,从我做起。为此,我们向参与本丛书的所有译者致敬。

蔡运龙

2003年8月27日
于北大蓝旗营寓所

序

这本《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汇集了西方学者,主要是西欧和北美 40 多位著名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地理学这个交叉学科的讨论。书中充满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领域、特性等问题的思辨和评论。主编和作者们的目的不是形成一本系统的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的理论专著,而是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地理学发展状态、前沿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平台和今后一个时期该学科发展及研究议程的论坛。

一

经济地理学的传统主题是何事在何处?为什么?应该怎样?从区域或“空间”的角度将这一主题进行扩展,问题就成为:众多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是集聚还是分散?集聚或分散是如何产生的?集聚或分散的程度受到那些因素影响?城市区位论的创立者 W. 克里斯塔勒在构思他的中心地理论及模型时,常常问自己:城市为什么有大有小,城市大小是受什么因素支配的?同样,我们也可以问:区域的发展特点为什么不同?发展程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异?为了这些既司空见惯又难以捉摸的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求科学地描述、解释、模拟和预测现实中的区域(“空间”)经济。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推动了经济地理学这门学科的生机勃勃的发展。

20 世纪 50 年代末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经济地理学基本思想是从前苏联学者那里学来的。U. G. 萨乌什金的《经济地理学导论》,以丰富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社会从狩猎、农耕、采掘、工业化等历史阶段,生产的发生地点和历史条件,揭示了“各国各地区生产发展的条件和特点”这一经济地理学的传统定义,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60 年代初我进入中国科学院,开始学习前苏联研究生产力布局、在空间

经济许多方面做出了独特建树的经济学家 A. E. 普洛勃斯特的著作,他以大量的技术经济的统计分析数据,揭示了决定经济的空间格局合理化的一系列原理。他的技术经济分析和论证的方法曾经给予了我们这一代经济地理学者很大的影响。那时经济地理学思想基本上是从交通、资源、社会制度等因素分析入手,阐述经济体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及发展特征。

20 世纪 70 年代末,我们这一辈人开始大量接触西方的现代地理学思想。1980 年我有幸到原联邦德国进修,具体地了解到在上述前苏联学者的区域经济思想提出之前,德国农业经济和农业地理学家 J. H. 杜能就提出了农业“孤立国”理论(即农业区位论),经济学家 A. 韦伯提出了工业区位论,经济学家 A. 廖什提出了市场网理论,地理学家 W. 克里斯塔勒提出了城市区位论。这些是古典经济地理学思想。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者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 D. 李嘉图的基础上,继承发展了古典贸易理论,也力图揭示空间经济的发展和地区间贸易的发生。代表人物俄林认为,工业区位的形成是按照由生产要素秉赋差异所决定的比较利益分工的结果。这些古典区位理论或者古典空间经济理论认为,空间经济中的区位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均衡的系统,这种空间均衡产生的基础是被设定的,即均质地表和完全竞争。作为经济地理学理论基础的区位理论,交通运费是影响空间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古典贸易理论和古典经济理论则是以运费为零作为假设前提的。

二次大战后,西欧和北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Neoclassic Theory),用来描述地区间贸易发生和空间经济规律。其假设前提是充分就业、完全竞争下的产品市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各地区的单位要素价格相同、地区间的运费为零等。在这些种假设条件下,要素报酬的地区差异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来达到平衡,即所谓市场机械主义(Market-mechanism)。其结果是可以最终导致人均收入地区差异的均衡。这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关于地区经济集聚和增长的主要理论,并广泛以数学模型加以表达。几乎在同时,在美国经济学家 W. 艾萨德的倡导下,出现了跨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区域科学”。“区域科学”使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逻辑、理论及方法,加入了地理学者所重视的空间因素,而且通常以数学模型加以分析和论证。但是,其模型也以众多的假设为特征。因此,仍未摆脱“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范畴。

在经济学家发展大量的数学模型和提倡“科学主义”以提高预测性的同时,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西欧和北美的主流经济地理学兴起了一股“计量革命”的浪潮。这一时期,W.艾萨德的区域科学方法对经济地理学者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诸多的地理学者们力求以数学模型及图形来刻画经济区域的现状及预测未来演变的趋势。为了将区域的社会经济要素及其发展变化过程、格局进行量化,地理学家们也广泛运用假设。例如假设人类的活动是有序的,每一个“经济人”和“经济体”都是处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但是,“计量革命”排斥了难以量化的空间因素,凡是无序的、不可验证的及模糊的空间事物,皆被认为不是知识,或者不属于知识的范畴,不予理会。其结果是无法描述和预测实际的区域经济。因此,受到来自业内外外的猛烈批判。

在计量化受阻而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P.克鲁格曼及其他几位经济学家力图将地理学的基本观念带入经济学领域。他们在强调实践中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外部经济、不完全竞争、空间集聚等的同时,也重视地理学所重视的区域、区位、距离等因素,并重视以数学模型来表达,以此解释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他们将此称之为“新经济地理学”。也有人称此动向为经济学的“地理转向”(geographical turn)。实际上他们仍然是以经济学家的视角,仅用经济因素分析空间经济。对社会及文化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几乎完全忽视。本质上仍未超越新古典经济的范畴,只能说是“新区域科学”。

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美的人文地理学,特别是经济地理学,发生了“制度转向”及“文化转向”的新变化,即引进了“制度环境”(包括各种正式的及非正式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特征)和“制度安排”(指组织形态、市场、公司商号、工会、议会、政府单位及国家福利制度等)等概念,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新观点来探讨经济的地理现象。学者们将一地的经济现象与该地的制度及文化因素联系起来,强调区域及地方的经济活动是嵌入在当地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系统之中而与之密不可分。这与经济学家仅用经济因素来分析经济现象,有本质上的不同。在这种背景下,在地理学范围内,也流行着“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概念。

本书的部分作者认为现在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时期。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地理学面对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区域经济,其内涵、议题等所表现

出来的历史随机性特别突出。大家的看法是不同的。

二

书中几十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就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前沿议题,包括全球经济一体化、公司战略与区位、创新的地理、地方性与差异、全球变革等的研究思路、概念和逻辑、范畴和论点等进行了思辨、评论与批评,拓展了经济地理学的范畴及其学科意义。如同本书主编在“前言”中所阐述的,本书在总体上:(1)捕捉和梳理了经济地理学学科当前的主要研究脉络和相关争论;(2)突出其交叉学科的特性,展开了不同学科在此领域的对话与交流;(3)通过阐述其主要研究脉络和议题,提出了经济地理学各主要研究领域的范畴。这对于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我们应该认真地关注。

本书的作者们强调,过去几十年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进入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时期,充满着各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思维争辩。初读本书可以得出,大量的思辨和评论围绕在:什么是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议题?如何对空间经济进行模拟和编制模型?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各种不同的学者如何以不同的视角考察实际的空间经济?等等。学者们在进行思辨时,涉及了现实经济生活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如经济变化的驱动力、全球化中地方之作用、区域的成长与衰落、地方创新系统、经济系统的空间重构、全球经济变化中的环境管制等。在阐述和揭示这些问题时,学者们从经济学、地理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学和政治科学等不同的学科加以切入。

书中各学科在此领域的对话与交流,有助于我们明确我们学科的本质及其模型化的作用和途径。

本书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新经济地理学”。书中有的学者认为,“以 P. 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发展可以模拟空间集聚经济的新数学模型,重新发现了经济地理学”。克氏自己也强调,新经济地理学就是力求描述现实中的空间经济。他认为,以往的贸易理论即新古典主义在模拟和解释空间经济时,选择最为省事的做法,即假设空间经济是静态、经济体之间处于完全竞争和要素的报酬不变(见第三章),而且大部分将世界想像为没有运输成本的空间,因而回避了地理问

题。他认为这不能解释经济空间。他认为需要从最基本的“经济人”的决策、规模报酬递增(由于经济体的空间集聚而产生的外部经济)、不完全竞争、再加上运费来加以阐述,并构建有关模型(描述事物的机器)。通过模拟,找出经济活动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借以解释一个经济体的地理结构如何被这些因素的消长所塑造。这就是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其模型具有多重均衡,即经济空间中多个经济体处于多种组合所形成的均衡体系之中。由于空间经济的自组织功能及某些因素的作用,例如经济体之间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即上下游联系,往往形成更大的集聚。从经济个体的集聚到产业的集中,动力来源于“外部经济”。而某一个“点”的外部经济导致的产业集中,就使这种多重均衡体系可能受到局部破坏。其结果就是核心-边缘模型产生,即核心区和边缘区格局形成。

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在解释乃至模拟经济个体的集聚到产业集中的动力来源时,引入“市场外部经济”的因素(即市场规模的变化可以通过生产商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导致生产商的集中或分散程度)。并因此提出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他们认为,运用这个因素,可以科学地揭示经济体的空间集聚及空间分散的机理;将这个因素与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等因素进行动态的、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综合分析,可以得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呈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他们争论到,这可以用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渐次扩散的原因。因此,他们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可以解释集聚的产生和外部经济源于何方,其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的区位理论(被西方部分学者称之为“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市场外部经济”和运费及规模经济等共同决定了经济体之间的距离。学者们在评价这个理论的特点时强调,这是克氏引入地理学家所强调的空间因素的标志(见第三章)。

总体上认同克氏的“新经济地理学”的地理学家不多。克氏及其支持者所说的“传统经济地理学”实际上是古典的区位理论。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计量革命”和70~8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派浪潮,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世界上各地区经济表现的差异不断加强,西方社会愈来愈多的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倾向于用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现实中的区域经济发展。这种趋势被学者们称之为经济地理学的

“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不少经济地理学家将此称之为“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目前正处于这个“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时期。很显然，这里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克氏等经济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

如何描述、模拟和预测经济空间及其演变，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有着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所强调的是报酬递增的原理，地理学家所强调的是区域（空间）的异质性，也就是说不同地点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特点的差异性。在描述当今世界上的区域经济时，距离（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所累积的表现）以及区域、国家之间和全球范围内的相互交织的因素是被分析的主要对象。在这里，地理学家采用一种综合的观点，试图理解地点和经济个体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之间，以及社会和生物物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而经济学家则倾向于对空间作简化处理，视为均质的和没有边界的。本书的作者之一詹米·佩克认为制度等因素的引入，“使经济地理学实践变得丰富起来。”他强调，制造商、供应商和承包商结合成为生产中心或者称之为产业集群，制度嵌入（即地方性的政治、社会组织等特征的嵌入和作用）是推动实现规模经济和创新的的重要因素。

地理学是关于区域差异和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的科学。这是一位英国地理学家给地理学下的定义（见《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商务印书馆，1999年）。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经济地理学就是要揭示区域经济的差异和经济区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这是经济地理学者的思维理念。但是，正如本书所显示的，在阐述一系列区域经济新因素及其作用和当代经济地理学面临的重大议题等具体讨论中，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具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和交集点。这一点，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三

在对待诸如区域经济的模拟和模型化等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带有地理学和经济学差异的色彩。

本书针对关于如何有效地认识实际的区域经济和阐述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时，作了大量的深刻思辨。特别是，实际的区域（空间）经济是“决定论”的还是“非决定论”？在认识和预测过程中，数学模型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长久以来，人们在提出和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总是力求寻找出一套观点或理

论,编制出相应的模型或者模式,提供一个可以一劳永逸、无所不能的区域发展和空间经济的模拟器。但结果是,对于同一个问题,“三个学者、四个观点”的现象在持续地重复着。

按照本书一些作者的说法,经济学家在编制模型时,设想(即假设)的性质过于明显。而地理学家则力求阐述现实中的经济区域,其中许多理想的因素是无法量化的。对此,经济学家,包括以往以艾萨德为代表的区域科学家,常常对部分要素做出假设。“数学方法牺牲复杂性以追求严密,在地理学家中并不流行”。“数学理论和部分数学模拟中所做的假设,使得世界可以缩减为数学逻辑”。但地理学家也认为数字是起作用的(见第六章)。由此他们强调需要将运输成本、地区种种差异等考虑在内,编制数学模型。但是由于现实的空间经济是连续的,运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和仿真的空间经济与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有很大的差别。很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很难加以彻底的理论化即量化。也不能肯定地预测其影响。由此,学者们强调,经济地理学应该具有“格式化”的倾向,但不可能完全做到“格式化”。现实中的区域经济“更可能是‘非决定性’,而不是决定性”(见第四章)。我个人在经过长期的体验后认为,地理学在进行数量分析和编制数学模型用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常常只是整个研究和分析的一部分,即我们所说的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但是,类似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主流”那里往往被贸易理论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是“半拉子”模型。

四

在 20 世纪的 40~60 年代的前苏联,经济地理学者就已经专注于“真实”的经济体布局和区域经济组织。他们没有在均质地表、完全竞争等一系列假设下进行经济的空间结构的理性推演。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学者,专注于我国的区域发展问题,按照影响因素、增长及其结构变化、区域布局等等工作模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规划。许多工作给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就这种研究规模和所起到的作用,我们超出了西方的“主流”。但是,在发展学科理论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引进并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了产业结构阶段论、空间结构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近年来

也有部分学者开展了经济国际化和信息化如何导致经济增长及其空间重构的研究以及对企业地理的研究等。但我们的学术思维和工作成果基本上是实证性的,而很少进行理论分析和思辨,更缺少关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个客体之间所形成的均衡态势及其演变分析,而这种所谓空间均衡的分析和推演对于认识理论上的和真实的经济区域(空间)、发展经济地理学的方法论是很必要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多年来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迅速发展中,也出现不可忽视的倾向:一些文章和著作停留在作一般的描述和一般性的汇总。其中也不乏想当然地发表没有针对性的议论,或者堆积了大量的空话和套话,缺乏有深度的思维挖掘和有宽度的横向分析。多数学者不具备多学科的理论知识。没有以新的概念、逻辑和朴实的科学语言揭示事物及其关联的习惯。我们在学术思想方面仍然是不活跃的。

如何以数学语言描述经济空间?我们不是不要模型,而是不要过于格式化,即追求“决定论”的数学模型,无所不包和一揽子去严密推导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型实际上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分析构架,一种分析问题的逻辑表达。模型,是我们分析准则的一部分(见第三章)。模型不一定是数学公式。近年来,我们通过研究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和看到生态学家研究生态价值化后受到启发:虽然我们不相信可以找到一个所谓“绿色 GDP”指标来替代现在的 GDP,但是我们认为可以设定一组指标(包括 GDP 在内)来代替现在的这个惟一的 GDP 指标。本书第五章作者提倡“用一套创新性的数据来测度新产品的创新,阐述城市中思想的生产,这样的新变量和数据集对于理解驱动城市增长的过程将是很有价值的”。高密度的城市可以具有更快的创新速度,“通过模仿各种各样的榜样和边看边学获得新的人力资本”。作者认为,揭示和描述城市中的思想生产,有助于认识驱动城市增长的过程。我认为,我们应该学习和运用这些做法;我们既不能在假设中描述和预测区域经济,也不能在某些难以量化的概念面前束手无策。

应该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交叉和融合是发展学科的重要途径。本书的作者们,无论经济学家或地理学家,各自工作的特点不同,考察问题的视角不同,但是并没有进行相互之间的批判和指责,没有妨碍他们在同一平台上就共同的对象进行观点的交流。他们也并不强调在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存在根本的对立。我们还注意到,对于一系列前沿领域和重要议题,他们的看法有分歧,并不是以专业和学科为基础的。这可能是一种追求真实的科学精神。